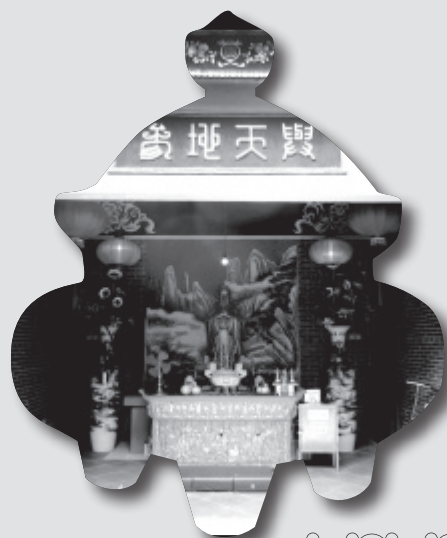


香港早期傳統
信仰風貌



這裏說的傳統信仰，指的是華人的傳統信仰，包括儒釋道三教信仰和民間的俗神崇拜。雖然說有華人的地方，自然會出現對華人傳統信仰的信奉，然而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地方對於傳統信仰的信奉其實各有特色。香港位於華南海隅，遠離中國的權力中心，近代以還更因着歷史形成的獨特政治處境，使蕞爾小島成為內地傳統宗教界嚮往的福地，享受風雨中的寧靜，為傳統宗教的發展提供了另外一個舞台，上演與內地不同的一齣古老文明進入現代的無痛版大戲。不過，這裏要講的不是這齣戲，而是這個舞台。所謂早期，大約會定格在開埠至上世紀初。這時的香港，華人經濟從傳統農耕、漁業和手工業開始進入現代資本主義商業，並逐步進佔主要地位，與此同時，華人精英亦正在爭取社會管治的話語權。這個階段，可說是香港華人傳統信仰的奠基時期。在此時期中，大致形成了兩個特色。一是族群特色：來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族群各自奉有神靈作為本族群的保護神，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族群的突出標誌，如水上居民奉拜天后、潮汕族群供奉三山國王等；二是行業特色：不同的行業又奉有不同神靈，如打石工人供奉譚公、戲行供奉華光、工匠供奉魯班等。不過，這兩個特色又不是絕然分野，而是互有滲透，如樊仙既是大埔碗窯特有的陶瓷行業神，亦是當地馬氏族人的保護神。顯然，在這個時期中，傳統信仰成為凝聚從事不同行業、來自不同地域的在港華人共識的主要方式，正越來越得到重視。特別是當華人經濟進一步壯大，華人精英又以之作為團結不同階層人士、共同推動社會發展的有效方



式，使到傳統信仰一度迸發出燦爛的異彩。

早期的香港與香港人

開埠時的香港是甚麼樣子的呢？請看以下兩段文字資料：

香港本海中荒島，在急水門外，地屬新安，距縣城一百餘里。舊有蛋戶十餘家，傍岸寄居，捕魚餬口。

溯香港之開，在道光二十一年，即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其始不過一荒僻小島耳，地為不毛之地，兼之山石巖巖，崎嶇斜曲，雖竭力經營，亦僅成平常鎮埠。

前一段文字，取自黃恩彤的《撫遠紀略》。黃是當時清政府的外交官員之一，被派出辦理中英《南京條約》。由於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自然極力掩飾，把香港說得不值一文，也就等於說朝廷不過是丟了荒島，損失不大。後段文字取自陳鏗勳《香港雜記》，陳是廣東南海人，在香港受教育，又與新學團體輔仁文社關係密切。他寫此書，雖謂記錄本地風貌，實有介紹西方政治文明的意思；把開埠前的香港貶低，實為抬舉英國人治理的成績。因兩人均別有懷抱，他們說的話，也只能作參考而已，不能全部作真。倒是英國人按管治的實際需要，出諸其經驗主義文化傳統，在開埠時所作的統計較為可信。該統計資料見諸港府 1841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首期《轅門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地 名	狀 況	居 民
赤柱	都邑、市鎮	2,000
香港	大漁村	200
黃泥涌	農村	300
公岩	石礦—貧窮村落	200
石凹	石礦—貧窮村落	150
筲箕灣	石礦—大村落	1,200
大石下	石礦—小村落	20
群大路	漁村	50
掃桿埔	小村落	10
紅香爐	小村落	50
西灣	小村落	30
大浪	小漁村	5
土地灣	石礦—小村落	60
大潭	小村落	20
東鼓灣	小村落	30
石塘咀	小村落	25
春坎	荒廢小漁村	
淺水灣	荒廢小漁村	
深水灣	荒廢小漁村	
石牌	荒廢小漁村	
以上合計		4,350
市場		800
住於艇上		2,000
九龍來的勞工		300
總人口		7,400



上環區），不少是屬於往來內地的行商；而居於艇上的居民，其中有漁民，也有從事水上客貨運輸者，加上來自九龍的勞工，又佔了總人口約三成，也就是說：當時不少香港居民其實是流動人口。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的特有現象，自然對此有直接的反映。以下，對應開埠時居民不同族群或職業身份的情況，選擇早期香港部分重要神靈信俗，進行簡略介紹，俾能了解其與民眾生活的密切關係：

天后信仰

據英人所記資料，他們登島時香港島有廟宇三座：鴨脷洲洪聖廟、赤柱天后廟、紅香爐天后廟，這些廟宇奉祀的都是海神。香港的水上居民分為蜆家和福佬（又稱鶴佬）兩個民系。香港人所謂福佬，是指來自廣東海陸豐地區的居民，早期多以捕魚為生；而蜆家人則是在廣東、廣西和福建一帶以船為家的漁民，屬於漢人，亦稱為古越人，是一支特有的、瀕臨消失的民系。歷史上蜆家人因居無定所，與中國安土重遷的主流文化不合，故備受歧視。這些水上居民都信奉天后。

對於香港地區天后廟的選址，香港學者廖迪生注意到其中的突出現象。他在《香港的天后崇拜》一書寫道：

……為何選擇在某一個地方蓋天后廟呢？在香港，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是，人們發現漂流的天后神像，認為這是天后要在那裏蓋廟的意思……港島銅鑼灣天后廟的創建也有一個類似

從《轅門報》及其他相關資料顯示，開埠時的港島雖算不上繁盛，但遠非海外孤島。在此地居住的人來自不同的方言族群，包括本地話、客家話、福佬話和蜆家話。居民有農民、漁民、打石工匠、商販和來自九龍的勞工。他們超過一半的人居於赤柱和市場（即今天的中



屯門三聖村每年天后誕仍保持傳統，信眾都會奉天后蓮輿登船海巡。

的傳說，根據現時天后廟的負責人戴氏所述，他們的祖先在銅鑼灣定居時，住在海邊的寮屋。有一天準備午睡的時候，看見一塊浮水石漂來，便隨手把石丟到遠處，但石還是漂回來，因而猜測浮水石是天后的代表，於是便在該地蓋起天后廟來……我認為「神像漂流」故事的重心，在於強調各天后廟之間的平等關係。當神像是漂來的時候，一間天后廟的建立與其他天后廟之間並沒有任何從屬的關係。事實上，香港各個天后廟之間各自獨立，各有自己的信眾基礎，自己的慶祝活動，這與台灣的天后廟之間的階序關係很不相同。

客觀上，這種現象也許正反映了早期香港崇信天后者以蟹民和福佬為多的現實。曾在香港滬西漁村長期進行田野考察的人類學家華德英（Barbara E. Ward），她認為浮家泛宅的水上人的社區認同，早期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他們可以通過該社區的小商店獲得貸款，從而得以渡過休整漁船的艱難日子；二是與該社區神靈建立了崇拜與庇蔭的互動，通過神誕及其他節慶活動，建立起年度的生活節律。她在一篇名為〈香港的一個漁村〉的文章中說：

……這些船主宣稱他們只要還記得滬西他們就會回來，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們感覺到他們對他們的神靈負有一個義務——他（神）居住在廟宇內面；他多年來保護他們；他們一定要回來滬西感謝神恩和懇求神靈繼續賜福。

談及這些神靈法力的故事，洪聖公，令人相信的很多。在兩個單獨的情景中，有兩個漁民在滬西節中違反了習例即船不能出海而後來遇難：其中一艘舢舨船主和他的太太在捕魚中被

火燒毀——火水燈突然爆發，而他的太太受到可怖的灼傷，幾乎雙目失明（她現在仍在村內，她的丈夫現在是負責打理廟宇）；而另一艘船在突然的狂風下翻轉，雖然他沒有喪失生命，他卻喪失了差不多所有的財產，包括他正在準備為另一島的不同神靈所供奉的整隻烤豬。

顯然，出於社區認同的需要，水上居民信奉的神靈，除了很靈驗，也不能不顯得有點排外。雖然華德英這裏說的是洪聖信仰，但以此角度看香港天后信仰的「漂流」現象，亦可見其中的奧妙。

楊侯信仰

侯王信仰是廣東南部地區的特有信仰，目前所知道的香港侯王廟或楊侯廟或兼奉楊侯的廟堂共十九間。著名的有：九龍城侯王廟、東涌侯王廟、大澳楊侯古廟、大圍侯王宮、厦村楊侯宮、屏山楊侯古廟、元崗村眾聖宮等等。毗連香港的深圳也建有侯王廟，目前保留的也不少，如寶安康楊二聖廟、寶安橋頭楊侯宮、福田石廈東村侯王宮、南山向南侯王廟等等。

有關侯王的來歷，九龍城侯王廟內有〈侯王廟聖史碑記〉，記之如下：

九龍砵西北有侯王廟，甚靈異……余曰：此殆楊亮節也……德祐二年，以淑妃弟亮節、修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元兵入臨安，奉二王走婺州……次官富場。九龍，古官富場地。疑亮節道病卒，葬於斯土。士人哀之，立廟以祀。



按此碑記的說法，侯王是宋末國舅楊亮節，因奉益王趙昰、廣王趙昺避元兵而南下，組織抗元，惜大志未竟，病逝並葬於九龍。士人在此立廟以祀，以慰餘哀。若按此說，則九龍城侯王廟就是侯王信仰的祖廟，地位非凡。不過，寫這篇碑記的陳伯陶，是清末翰林，一生以遺民自居。他的說法難免有點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所以不為人重信。再者，在土瓜灣亦流傳另一種不同說法，謂當時宋帝逃抵九龍後，因舟車勞頓並飽受驚嚇，患上重病，幸得一位「楊二伯公」醫治方得痊癒。其後，眾大臣想向這位長者道謝，但尋訪之下只得一個「楊二伯公」的墓地，故當地人認為是「楊侯」顯靈，便設廟供奉。不但如此，其實侯王廟的侯王不一定姓楊，深圳南山向南侯王廟內奉祀的，便是被稱為明代十二諸侯之一的陳忠勇。由此觀之，可把侯王是誰的問題暫且放一放，先梳理侯王的信奉情況，也許會別有啟發。

從目前所得到的材料觀察，侯王廟的建置似乎都與戰爭有不解之緣。如據說源於宋末楊亮節的九龍城侯王廟；另亦源於宋末的、奉祀化州路總管羅郭佐的湛江羅侯王廟；深圳南山向南侯王廟奉祀的陳忠勇，據說也是庶民出身，官至大將軍的武將。侯王廟的所在地也大都與防衛有關，如九龍城、東涌和大圍等，令人聯想到南宋的屯軍傳統。南宋初年，為改革北宋軍政之弊，推行屯軍，逐漸形成五支屯駐大軍。屯軍的動員力和戰鬥力都非常強大，惟只聽命於負責管轄之將領，一如稱為岳家軍的後護軍。為防再出現黃袍加身一類情況，南宋組建新軍代替屯軍，卻因部隊戰鬥力下降，終為元所滅。



沙田大圍積存圍所奉楊侯大王。據廟碑所述：「楊侯王爺率領前頭部隊，化裝農民，南下九龍新界，分居大圍村附近及東涌農地，藉農為業，其實策劃及督建九龍城寨，以備迎護宋帝昀。」



不過，在後期的抗元過程中，朝廷對軍隊的節制減弱，屯軍傳統再度受到重視也是十分合理的事。當朝廷覆滅，抗元無望，這些部隊不少士兵便留粵生活，本來的領軍將領成為開墾生息的領袖。當將領仙逝，後人為建立屯區公共管理體制，乃奉領軍將領為神，建廟立祠，會商公事——這也許就是各地所以建置侯王廟的淵源由來。

車公信仰

有傳說謂車公為楊侯部將，同護宋帝至港。與楊侯崇拜相比，車公崇拜地域相對狹小。據香港掌故學者周樹佳的調查，供奉車公的廟宇主要集中在新界：西貢蠔涌車公古廟、沙田大圍車公廟、橫洲二聖公（洪聖與車公）、厦村新圍楊侯廟，另深圳有車公廟路，據說舊日該地曾有車公古廟，是車公最早的駐軍之地。關於車公來歷，1930年代黃佩佳遊沙田車公廟，記道：

然車公一神，多不知為何許人。或曰，此地彗星車坤也。車坤，周時人，姜尚封神曾及之，備見稗官野史。惟據該廟司祝言，車公，周代雷神也，歷朝封為南昌五福車大元帥者，是或車公之來歷也。

香港車公信仰以西貢蠔涌車公古廟為祖廟。該廟始建於明代，大門有聯：「鼇蜃肅精禋，蕉黃荔紫；黔羸開瘴霧，水綠山青。」「鼇蜃」，比喻靈感通微；「黔羸」，亦作黔雷，開闢之神。聯意大致是：為靈應的神靈準備



西貢蠔涌車公古廟



豐美的祭品，答謝他開闢這塊瘴癘之地為綠水青山的功業。該廟光緒七年辛巳（1881）十二月聯：「義勇忠仁，英烈千秋昭北闕；康寧壽富，麻祥五福蔭南天。」光緒三十四年（1908）聯：「功律著於南方，四海土民歌保障；德覃敷及異域，千秋黎庶賴安康。」各聯均圍繞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說明車公先為部將，復作開闢之神而受到供奉。此廟雖為祖廟，但今天若論知名度卻似乎不如沙田大圍車公廟。

沙田大圍車公廟應為當地田心村於明末開村立基時，有感村前三支河流交匯，於是村民集資建一小神廟於此山崗之下，自蠔涌供奉車公爺爺以鎮水口，祈求村民平安、丁財兩旺。此後，村民更在村中選出長者為廟祝，眾人科米科銀作為其守廟的酬勞。據說以前，廟祝之位世代由田心村韋姓村民出任，直至1929年由華人廟宇委員會接管為止。由於車公廟始建自田心村村民，所以田心村每年正月十四元宵點燈，村民舞動麒麟，列隊浩浩蕩蕩到車公古廟（舊廟）迎請車公爺爺駕臨村前臨時搭建的燈棚賞燈。此一傳統保留至今，亦是整個沙田區惟一享有此權利的村落。

大圍車公廟亦是沙田九約每十年一度太平清醮的舉辦地。該風俗源起自清中葉，其時沙田區內疫症流行，區內居民前往拜祀，祈求平安，後更恭奉車公爺爺遍遊九約各村以驅瘟疫。果然，疫魔隨之漸散，村民為酬謝神恩，常往香奉祀。鑒於小廟地方淺窄，九約居民發起捐資擴建，光緒初年乙亥（1875）落成，從此成立「九約」，在車公神前許願，每十年一次，以天干「乙」字

之年，啟建太平清醮以酬神恩並庇物阜民安，此活動一直持續至今。

車公之驅疫神通，使他由田心村之護村神，迅速轉變為護蔭沙田九約之地方神靈，車公廟亦由此成為沙田區內重要的權力象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田心村與九約之間關於車公廟廟產的爭奪，也可看成是地區領導權爭奪的反映。1932年，港府以華廟會介入處理，因而亦不純然是《華人廟宇條例》的執行問題，此舉亦反映了港府對新界地區傳統鄉治的一種態度。

樊仙信仰

農民除了務農，亦會因地制宜從事相關的手工業生產。大埔碗窯馬氏崇奉的樊仙，原先就是護佑其從事之陶瓷業的行業神。據說碗窯因土質優良，水源豐富，所以一直就有出產陶瓷，初由文謝兩氏主持。清康熙年間因為遷界被迫放棄，復界後由梅州長樂（今稱五華）馬氏接管。馬氏在五華亦從事陶瓷，他們把所尊奉的行業神樊仙請至香港，並設廟供奉，直至今日。

樊仙的來歷也不是很清楚的，有說是與魯班同時的工匠，以發明陶瓷超越魯班，也有說樊仙不是一人，而是兄弟三人等等。舊日蔣洪順曾對碗窯進行調查，研究當地瓷業歷史。據他的記錄，樊仙宮殿上內堂兩柱之側有同治戊辰（1868）陽月穀旦聯云：

仙骨披風流，蒲雞化神，億萬家共荷甄陶滂澤；



梅州五華碗陶村曾奉之挽雞樊仙像

廟模宜雲錦，松龍異昔，千百世永瞻赫曜英靈。

此聯在其後丙辰年（1976）仲春重修時作了重大改動，再掛回原位，新聯如下：

仙骨披風流，蒲雞化酒，甄陶滂澤；

廟模壹雲錦，億千百世，赫曜英靈。

舊聯中一些重要原素，如蒲雞化神、松龍異昔等，在新聯中被改動甚至刪去了，因此不甚好懂。筆者曾到馬氏的故鄉梅州五華進行調查，發現樊仙舊像，左手實有挽雞一隻，遂懷疑蒲雞與樊仙之間有互變關係，而在港後人知不妥而隱瞞，亦可能因他們不清楚情況而妄改。古人不懂科學原理，對於事物的變化感到很神奇，如黃大仙信仰，說黃初平叱石成羊，把硬繃繃的石頭變成軟綿綿的羔羊，因而傳誦千載。陶土變成陶瓷，牽涉土質、火候和製作經驗等多種因素，很不好掌握，從業者產生神秘之感，而對善於變化的神靈產生崇拜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次調查，還發現五華樊仙宮的所在位置，很是靠近當地燒製陶瓷的土窯窯口。當地長者還說明，舊日開工和啟窯時都會祀拜樊仙，以求工作順暢、一窯精品，可見他們對這位掌變之神奉拜之誠。

譚公信仰

關於譚公其人，一向以來有多種傳說，分別認為是譚德、譚公道和譚峭。譚德為童子，譚公道為老丈，譚



峭則是道教著名道士。三人本來很難牽扯在一起，然而在民間信仰中則不然，老百姓對自己尊奉的神祇，有時會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靈異都包攬在他身上。關於譚公，根據流傳在惠東九龍峰龍峰祖廟附近的譚公傳說，他似原是客家巫覡，自少可呼風喚雨，降龍伏虎，而且扶危救困，造福鄉梓，故深受信奉。譚公被客家視為風雨之神，祖廟今仍存光緒十六年（1890）「靈雨既零」匾額，反映其時當地農民對譚公降雨解旱的感恩。而正因譚公風雨，活躍於惠東的水上客家亦視之為保護神，以期水上浮生不受風雨之苦。水上客家從事的營生，分別有客貨運輸和漁業兩種，往來於南中國海域和珠江三角洲水網內。因而譚公信仰除了在惠東地區傳播，亦隨着惠東水上客家的行腳，廣泛傳至沿海地區，如海豐、葵涌、大鵬、沅梓、澳門、香港乃至東南亞等地。現時香港的筲箕灣、黃泥涌、東坪洲及西貢等地，都有供奉譚公的廟宇。

香港開埠初期，鑿山開道，興築海堤，需要大量石匠。據香港羅香林教授〈香港早期之打石史跡及其與香港建設之關係〉一文記載：「綜觀港九之偉大建築，或外表全部以光面石砌成，或柱礎拱門與石柱石欄杆等尤變化多而美觀，成為一種風格，而石砌之海堤與穿山道路工程亦偉，此蓋以港九之地理環境使然，而客家石工石匠，遂得盡其勞力，發揮其在香港建築之功能。」當時，居於廣東梅州五華的嘉應州派石匠，以善打花崗石柱礎著稱。他們隨惠東水上客家航船至港，百年以來，不下數萬人。其時香港，西自荷李活道西頭，經西營盤以至



筲箕灣譚公誕會景巡遊，小朋友出演譚公。



石塘咀、薄扶林等處，東自大道東經跑馬地、銅鑼灣、大坑、北角以至筲箕灣等地，皆為五華石匠來港打石之地。西營盤、薄扶林、大坑、筲箕灣等地亦因石匠所居而成村落。英人佔港時，筲箕灣已是有一千二百口人，僅次於赤柱的本地人聚居地。當時的居民大概是以漁民和打石工人為主，其中來自客家地區的惠東和五華人，則以譚公為他們共同信奉的神祇。

源於本土的譚公保境安民傳說的產生，說明筲箕灣陸上居民對譚公的信靠與日俱增。如香港早年水災，有漁民目睹在柴灣海面，有神人金盔金甲，頭戴紫金冠，正與龍神相搏，以解救一地蒼生。神人戰勝惡龍後，自謂為（九）龍峰成道之譚公，供奉可保平安。1941年12月17日，日軍襲港，部署重炮強攻阿公岩鯉魚門炮台。當時炮火紛飛，筲箕灣遭遇重創，東大街幾成廢墟，惟居民早已避禍遷走，漁船駛離，傷亡減至最少。而矗立在海隅的小小的譚公廟，竟固若金湯，毫髮無損，甚至傳說當時日軍炮彈落於廟前亦會成為啞彈，此事當然會被視為神跡。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結束後，香港重光，英軍接收日軍在阿公岩所建軍火庫，可能因軍火處置不善，1946年3月21日突然發生爆炸，禍及東大街近阿公岩段，傷亡人數達十多人。據老街坊憶述，當時有火路直撲東大街內的火水（煤油）店，因店內存放大量易燃物，波及之下足以焚毀整個筲箕灣，萬分危急之時，火路燃經譚公廟卻忽然自動熄滅。此事被視為譚公靈應，保境安民事跡流傳至今。